



# “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 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于2017年11月4—5日在湖南衡阳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70余位抗战研究专家、青年学者、志愿者、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培育、方先觉将军之子方庆中、抗日战争纪念馆总编何誉军、《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等人在开幕式或会场讨论中都指出,湖南抗战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湖南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会议主办方遴选出20篇论文,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五个场次的专题讨论。现将会议论文简要综述如下。

## 一、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讨论会对敌后战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问题的分析上。其中有两篇文章在华南、华中等区域敌后战场的战略研究上有所推进。

杨新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其发展(1938—1944)》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状况,认为在抗战爆发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共广东党内部存在着“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的问题,致使东江等地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动与展开相对滞后于华北、华中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广东党组织才彻底走上独立自主展开敌后武装游击斗争之路。

郭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一文,梳理了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形成及其转变,认为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最初是向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中原地区进军,且主要由八路军负责,新四军起辅助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到1939年底,中共不得不改变战略,将经略的重点由河南转向苏北,且开始由新四军主要负责,八路军负责支援。郭文同时探讨了这种战略转变对山东地区的影响。

## 二、国民党战时军政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军事领导、武装力量、兵役、军事教育、情报工作等方面制定了



相应的制度,试图增强抗战力量。本次会议从两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其一是探讨国民党建立配合抗日战争和军事行动的相关政治制度。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党国体制与战时体制的司法交集》一文,探讨了抗战时期在党国体制与战时体制相互交集的特定状态中,战区检察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文章详细论述了战区检察官的甄训、人员构成及其组织活动内容,指出战区检察官制度的出现是国民党长期以来试图将司法体系纳入党国体制进程中的一环,国民党希望通过在抗战时期建立这一制度来充实、强化检察系统,以增强抗战能力,但内部的派系矛盾等原因导致实际运作与此背道而驰,使其逐渐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

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总体战”“军令军政一元化”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7—1945)》一文,分析了军事委员会这一国民政府军事决策与统率机关在抗战期间组织结构上的调整过程,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作者指出,“总体战”“军令军政一元化”等西方新军事理念在国民党军中的流行,影响了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和发展轨迹。抗战期间,在“总体战”学说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将战前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的军事指挥管理机构改组为融党政军大权为一体的大本营。大本营运行仅4个月,因弊端丛生再度改组,军事委员会复归,“军令军政一元化”的设想形式上在军事委员会中得以实现。但在军令、军政二元分立传统浓厚的军事委员会中,新机构不断增设,在健全军事委员会功能的同时,也导致其“分”和“散”的体制缺陷日益明显。

国民政府曾制定建立忠烈祠制度,以激发民族主义精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规模营建忠烈祠,有着重要的战时政治、军事、文化意义。王余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个意义世界的诞生:抗战时期的“国家纪念空间”——以南岳忠烈祠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国民政府对南岳忠烈祠的建设为中心,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营造以忠烈祠为代表的国家纪念空间及其政治、文化意涵。作者认为其意义是多重的:一是作为原始意义的烈士表彰;二是作为战争应对机制,在最大范围内、最大程度上实现抗战动员;三是作为党国符号,表达与建构国民党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其二是探讨国民政府的战时兵役制度、兵工生产、军事教育。抗战时期,兵役制度的实施更为急迫,其影响更为重要。姜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国民政府兵役管区制度构想与战时运作》中,对作为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兵役管区制度进行了考察,对国民政府对兵役管区制度的构想及其在战时的具体运作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作者指出,兵役管区的设置标志着战时中国兵役制度化的初步形成,在制度与实践中,兵役管区担负着征兵、训练与补充三位一体的重要职能。但在战时压力下,这一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病,影响到了前线野战部队的补充。文章还探讨了战时作战军队与后方军政部门、省政府与军方之间交错纠葛的关系。

高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抗战前国民政府兵工生产调整工作研究(1928—1937)》一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已出版的各类资料,梳理了抗战前国民政府兵工生产调整工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各阶段调整工作的重点,并分析了战前兵工生产与武器制式化的联系及其对抗战的影响。作者认为,至抗战爆发前,中国兵工业制式化生产的格局初步形成,从而为抗战时期的兵工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项浩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兼论抗战时期国军的教育训练》一文中利用新近出版的《胡宗南先生日记》,结合相关的档案、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为考察对象,对第七分校的成立过程、机构设置、养成教育、召集教育等诸多面相进行深入探究,梳理出其发展脉络,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揭示出其所具有的深层次意涵。作者试

图通过全面、系统地呈现第七分校军事教育与训练事业的完整面貌,观察和探讨抗战时期国军军事状况。

### 三、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

军事情报工作在战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及其组织活动是此次会议探讨的一个亮点。

于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探析》中,对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工作进行了整体性的探讨。文章指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搜集、分析工作较之以往已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军令部的设立使国民党军的军情处理制度日趋完备,通讯技术的改善亦使国民党军高层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前线敌军动向。但由于体制的困扰,以及前线将领上报情报的不准确,容易造成指挥机关误判军情,影响整个作战计划。1938年豫东作战的失利即与国民党军高层的研判失误及下级部队的谎报军情等有关,从而影响到徐州会战后期战局的走势,最终导致国民党被迫在花园口掘堤阻敌。

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军令部战时情报工作与效果》,着重对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机关的军令部的情报工作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分析军令部军事情报业务机构与职掌、军令部第二厅与军统局的关系、军令部军事情报效果等问题。作者指出,就抗战时期军事情报而言,军统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军令部第二厅才是战时军事情报业务开展实施的主要机关。军令部的情报工作在搜集方面相对出色,但分析部分则表现一般,最终造成军令部军事情报差强人意的结果。

苏圣雄(台北“国史馆”)的《军事委员会的战争情报及其组织——以徐州会战为中心》一文,以徐州会战中军事委员会的作用为探讨对象,分析军事委员会下辖之军委会办公厅、调查统计局、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军令部等情报机关的情报来源、内容等问题,并阐释各情报的准确性以及对军委会指挥判断的影响。作者认为,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各情报组织积极发展运作,至徐州会战前,军委会所属各情报机关相互整合,建立体系,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为国军能及时于台儿庄周围集结兵力并迫使日军撤退,发挥了一定作用。

邝智文(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的《国民党在日据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情报活动(1942—1945)》一文,以中、英、日三方档案史料为基础,从细部重构国民党抗战期间在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情报活动,包括其组织、人员、目标以及程序等,审视其情报的内容性质与水平,以尝试重探国民党情报人员在香港的秘密战经过以及其成效。作者指出,这些细节看似对战争大局无关紧要,实际上却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国民政府党务与情报人员在香港始终成效有限,并在日军投降时未能在九龙和新界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亦从侧面解释了国民党在港工作的失败。此文亦从微观角度讨论了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与中共及盟国之间一面抗战,一面内争的过程,以及国民政府与盟国建立实质军事合作的难度。

### 四、国民党的抗战准备及其内部冲突

抗战前期,国民党内部对日军侵华的态度和应对举措不一。此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以个案的视角分析了国民党对日军侵华的应对及影响,一篇以广东军政关系为例分析国民党内部矛盾对抗战局势的影响,另一篇从城防构筑的视角分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准备。

钟健(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蒋介石对七七事变之军事因应新论》中,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等史料,从相对宏观的历史脉络与具体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对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种种军事举措的内在逻辑及其深意进行分析,进而探究蒋介石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的深层原因。作者指出,由于蒋介石不能预估七七事变会演变为中日全面战争,其在战争爆发初期表现出战和不定的心态实属正常。作者还指出,后人为认知与书写历史之便利,往往会追认某些历史事件作为重大历史节点,从而可能割裂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这一情形也出现在抗战研究中,既有的抗战研究多从七七事变开始谈起,从而直接影响到对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后一系列军事举措的解读。

黄宝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从“副王”到弃子——于学忠与华北危局》一文,从地方实力派的角度对身处华北危局中的于学忠进行考察,分析了于学忠与其时各种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试图重构以于学忠为中心的华北危局史叙事,并希望以另一种视角展现日本的侵略活动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作者指出,于学忠作为河北省主席,在1932—1935年的华北政坛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因其缺乏对全局问题的思考,在某些关键时刻做出错误判断,最终被迫离开华北。

王英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龃龉不合: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中,探讨了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结束,国民党中央恢复对广东实际统治之后,广东地区军政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广东抗战局势的影响。作者指出,抗战爆发后,广东被纳入到国民政府统一筹划之中,积极进行抗战准备工作。然而,1937年之后广东形成余汉谋主军、吴铁城主政、曾养甫主党的“三足鼎立”的军政格局,围绕地方人事布局和地方武装权属问题,各方之间互相倾轧,军政分歧不断,给广东对日抗战准备工作带来严重干扰,从而影响广东抗战大局,使得日军在极短时间内攻陷广州。

杨向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孤城难守:南京城防与首都卫戍战》中,依据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将南京城防放在首都卫戍战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对南京城防规划建设的过程、面临的困境,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细致分析。作者认为,南京城防工事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在阻止日军进攻时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作者从城市安全的角度对首都卫戍战以及当时的城防构筑提出三点反思:第一,南京城防的理论还是一战时期堡垒化防线的指导思想,缺乏战略纵深和灵活性;第二,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坚固的城防仅仅是一个方面,战略、战术、指挥、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等都制约着战争的成败;第三,在立体化的现代战争中,城市防守必须与周边战区密切配合方能取胜。抗战时期的南京在这三点上皆有欠缺,故而导致孤城难守的结局。

## 五、日本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日军制定了非常周详的侵华军事战略、策略,也为战争的顺利进行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王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日军衡阳会战中化学武器的使用》一文中探讨了抗战时期日军在衡阳会战中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文章指出,日军第十一军在衡阳会战中的化学武器使用是决定其取得军事胜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使用化学武器取得了军事效果的原因,在于其所攻击的是缺乏最基本化学战防御装备和能力的中国守军。

王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征发”》一文,讨论日军在侵华期间对中国民间物资与劳力进行征调的“征发”活动。文章论述了近代日本对“征发”的法理认识以及在

此基础上所构建的战地“征发”模式,并探讨了这种模式在战时中国的实际实施状况和普通日本士兵面对“征发”的心理构造。作者认为,近代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战地“征发”的法理认识,既来自其自身对战时国际法的理解,也来自战地日军的现实考量。日本设计的战地“征发”的模式巧妙地糅入自身的利益诉求,意图使其在他国领土上的掠取具有合法性。作者最后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地“征发”,无论是否符合国际法,都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产物。

日本对华“和平工作”,实际上是日本因战争需要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张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日本对华“和平工作”》一文,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从日本当局的侵华战略决策入手,具体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日本对华“和平工作”,进而分析国际形势因素对日本侵华决策的影响,以及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困局与其发起太平洋战争的关系等问题。

综观各位专家学者相关发言、讨论和参会论文,可以看出,此次会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关于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敌后战场、国民党战时政治与军事制度、兵役、军事教育、情报工作、日军侵华军事与外交活动等方面;二是指出湖南在抗战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三是拓宽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视角,如国民党情报工作、日军在中国战地“征发”工作等选题都较为新颖;四是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有新突破,如苏圣雄文,运用了大量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以及台北“国史馆”所藏资料;五是激励青年学者的成长,会议征集的论文涵盖了不少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专家对这些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以“抗日战争军事史”为中心,涉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多个层面。大部分会议论文选题较新,资料翔实,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会场讨论问题意识和针对性强,对与会学者进一步提升其学术研究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晓娟)